

## 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

牛 军

**摘 要** 1950年春开始的“援越抗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次大规模军事援外行动,也是新中国军事介入周边事务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它对整个冷战时期的中国东亚政策和援外政策均产生了长远影响。不透彻研究“援越抗法”,就无法完整深入地理解冷战时期中国的东亚政策、援外政策和印度支那政策的缘起、动力和主要特征。文章作为建国后地区战略史研究的一部分,大致按照历史脉络分别叙述“援越抗法”的起因、根本原则、主要动力及其对中国的印支政策和中越关系的复杂影响,力图完整呈现“援越抗法”的丰富内涵,并论证在革命意识形态、中苏同盟与地缘安全观等因素互动的过程中,支援东亚地区革命运动和推广中国革命经验等因素在“援越抗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对外援助之道义原则的提出、形成和主要行为模式等,均与此直接相关。

**关键词** 冷战 援越抗法 中国外交 东亚政策 对外援助

1950年4月开始的“援越抗法”是建国后首次大规模军事援外行动。它酝酿于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形成于中苏谈判结盟时期,是新中国迈出军事介入周边事务的第一步,也是理解冷战时期中国援外政策的第一个历史故事。以往的研究都简单描述援越抗法的决策过程或中方在策划重要战役中的作用,<sup>①</sup>却忽略了很多有长远影响的重要内容(包括革命意识形态、中苏同盟与地缘安全观等之间的互动对中国东亚政策的具体影响;中国对外援助中道义原则的提出与主要特点;中国印支政策的形成与中越矛盾的历史缘由,等等)。这种忽略导致严重低估了援越抗法对冷战时期中国东亚政策和援外政策的持续影响,意味着迄今对冷战时期中国东亚政策和

\*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①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6—152页;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1, pp. 119—144。

援外政策的理解存在严重缺陷。本文的目的就是呈现一个更完整的援越抗法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政策产生的主要动力、主要内容和主要经验等等。由于涉及诸多领域，本文在论述中提出的问题会多于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其中一些问题当时尚处于萌发状态、后来才逐步发展成尖锐的矛盾，本文涉及的历史时期有限，无法概括解释，专此说明。

## 一、“援越抗法”的缘起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春，中共与越南共产党（当时称为越盟）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毛泽东不久后即表明他已经萌生了未来支持越南抗法斗争的想法。<sup>①</sup>他在内战转折时期即想到要支援越南，其基本原因是两国革命运动的历史联系，中共与越共交往在源头上同共产国际有直接关系。胡志明在巴黎结识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大革命期间，胡志明在广州担任过苏联顾问的翻译。后来胡志明同中共领导人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当时双方的核心认同就是中共与越共是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下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同志关系。这种关系后来被称为“同志加兄弟”是十分贴切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胡志明曾领导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1946年12月，法军进攻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立刻号召奋起抵抗，越南抗法战争从此开始。此时正值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广西地区的一些中共部队为躲避国民党军队追剿，曾经分散进入越南境内，并且得到了越共部队的接待和保护，中共边境地区党组织还在越南境内开办过干部培训班。双方还有过层级比较低的军事合作，越共游击队帮助边境地区的中共部队攻占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sup>②</sup>越南历史学家描述说，1949年初，越军有两个排的“主力部队”在广西地区参加解放军作战。<sup>③</sup>

中共领导人真正开始关注印支地区是在解放军打过长江以后，这同军事形势有直接关系。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如果广西的白崇禧部队退到印支地区，中共军队将坚决追击到那里予以消灭，并且同时消灭其他敢于抗拒的“反动派”。<sup>④</sup>后者很可能包括法国军队。斯大林则劝告中共军队不要进入印支地区，以免引起美英法的干涉。他打电报告诉毛泽东，应警惕美英军队在华北港口登陆，不要急于派军队到华

① 《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2月）。

② 参阅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页；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编《中越关系大事记》，1980年3月印刷，第33页。

③ 范春衡《奠边府：历史与今天》，载杨保筠、于向东主编《变动世界中的奠边府战役与日内瓦会议》，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第51页。

④ “Cable, Kovalev to Stalin, Report on the 22 May CCP CC Politburo Discussion”, May 23, 1949 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afterhere *CWIHP*), Issue 16, 2007, p. 164.

南边境地区去。<sup>①</sup> 中共中央后来为了防止美国的干涉,明确规定中共军队不得越过国境线,这样越共的帮助就显得比较重要了。这是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直接原因。<sup>②</sup> 斯大林的建议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列强是否会利用越南作为军事干涉中国革命的基地。他们当时认为美英法等有可能加强在印支的军事存在,但从那里发动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并不高。<sup>③</sup> 分析内战后期中共领导人的这类思考有重要价值,因为他们在建国后继续将印支地区作为存在安全威胁的战略方向,而且地缘安全考虑在中国印支政策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从对外政策的角度看,中共中央在建国前夕将越南归类为存在革命斗争的东亚国家,而“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已经是或将要是武装的游击战争”。<sup>④</sup> 《人民日报》对越南抗法斗争的报道虽有增加但仍很少,其中包括转载苏联《真理报》的文章和越盟歼灭法军的消息。<sup>⑤</sup> 总的看来,中共中央与越共的交往这时既不密切也不深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军向西南进军。越共中央代表李班、阮德瑞于10月秘密到达北京,要求得到军事援助和恢复两党高层的直接联系。中共中央这时很希望越共能协助阻止一些国民党军队败逃到越南境内。不过双方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发生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当时中国领导人做出两个重要的决定: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和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越南)建交。

毛泽东启程赴莫斯科后不久,广西战役即告结束。云南卢汉宣布起义后,由于中共军队尚不能及时开进,国民党李弥所部开始向云南边境地区转移,这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警惕,他们担心李弥的部队进入越南就会从后方威胁越共军队,故多次指示有关部队迅速截击向越南境内败逃的国民党军队。<sup>⑥</sup> 此时法军也在加强在中越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以防止中国国内战事蔓延到越南境内。法军行动引起中共中央的警惕,担心他们向国民党军队提供庇护。1949年11月30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谴责国民政府正企图使越南成为其“卷土重来的基地”,警告法国殖民当局不得“容留国民党反动武装”。<sup>⑦</sup> 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和法国殖民政府加强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是造成中国领导人认为越南涉及中国的安全利益并感到有必要进行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

12月24日,刘少奇向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报告了云南政治和军事局势,他同时转

① “Cable, Stalin to Mao Zedong (via Kovalev)”, May 26, 1949, *CWIHP*, Issue 16, p. 166.

② 刘少奇《关于截击和解交逃入越南境内国民党军残部问题的电报》(1949年12月,1950年2月、3月);《军委为准备进军云南给林彪等的电报》(1949年12月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97—199、201页。

③ 《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6月12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存, No. 16525。

④ 刘少奇《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8月14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50页。

⑤ 《英勇抵抗法帝侵略 越南共和国益强国》,《人民日报》,1949年9月10日。

⑥ 刘少奇《军委命令林彪部迎击国民党军的电报》(1949年12月26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33页。

⑦ 《人民日报》,1949年11月30日。

达说越共代表明确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希望中国提供一笔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包括三个师的军事装备和物资,1000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以及派遣军事干部到越南协助指挥作战。二是要求中国与越南互相给予外交承认。对于军事援助,刘少奇告诉毛泽东,在北京的领导人认为可以援助但要有节制。武器装备和医药器材可以提供,“但不能给予太多”;部分物资可通过贸易解决,“但不能有一千万美元”;军事干部可以派,不过要先派遣罗贵波带电台前往了解情况,“然后再派军事干部”。总之是不能立刻和完全接受越方的要求。对于外交承认,刘少奇报告说政治局开会时权衡了利弊,他们认为在法国没有承认中国之前,与“胡志明建立外交关系是可以的,利多害少”。用“是可以的”这样的行文显然并不是表达十分积极的态度,而且他们是看到了还是有“害”的,只是比“利”少而已。至于“害”是什么刘少奇没说,他请示毛泽东做决定。<sup>①</sup>实际上,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而言这并不是那么容易权衡利害的。1954 年日内瓦谈判期间,法国代表告诉周恩来,他们原来是准备承认新中国的,后来由于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而未能实现”。<sup>②</sup>

毛泽东此刻正在莫斯科,他接到刘少奇来电的当天即回电,对援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同他正与斯大林会谈有关,在莫斯科经常需要从世界革命运动的角度讨论问题,不过他这时还是坚持了“先谈判,后建交”的既定方针。他指示刘少奇转告越共,需“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公开来访,北京要“予以公开欢迎”;援越物资则要采取逐步增加的步骤,以便越方“善于掌握这些物资”;罗贵波带电台去越南很有必要,要“谆嘱”他“务须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多鼓励、不要批评”。毛泽东还首次提出派到越南的军事干部只能做“顾问”。<sup>③</sup>这是中国后来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团”的由来。

毛泽东的积极表态有力地推动了双方的讨论。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即电告越方立即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来北京”。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他明确提出越代表团“应秘密地来到中国,不应公开”。<sup>④</sup>第二天,刘少奇又电告对方,表示中国“很愿意”给越共“一些援助”,并将派遣一个代表并随同五六个人带电台前往越共控制地区。<sup>⑤</sup>与此同时,林彪也派遣四野 151 师向老街靖边方向进军,以便截击可能退入越南的国民党军队。中方还明显加强了对中越边境贸易和人员往来的管理。

显然,在北京的领导人比毛泽东要谨慎,他们在没有了解清楚越方实际状况之前,并不打算贸然承诺提供更多的援助。另一个原因同中共中央不赞成胡志明在

<sup>①</sup> 刘少奇《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 年 12 月 24 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 226—227 页。

<sup>②</sup> 《吉勒马慈及保罗-彭古宴请王炳南谈话纪要》(1954 年 5 月 18 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 年日内瓦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第 260 页。

<sup>③</sup>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9 年 12 月 24 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 228 页。

<sup>④</sup> 刘少奇《中共中央关于接待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代表团问题的电报》(1949 年 12 月 24 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 229 页。

<sup>⑤</sup> 刘少奇《中共中央关于拟派代表赴越南问题给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的电报》(1949 年 12 月 25 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 231 页。

1946年事变之前对法国的妥协有关,他们认为那种“中立”政策是错误的。当时胡志明基于策略考虑一度同法国殖民当局合作。特别是他还给杜鲁门政府写过几封信,要求美国支持越南独立。<sup>①</sup>当时正值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很反对“各国人民”随着大国间的妥协也妥协。<sup>②</sup>显然,双方这个阶段的交往还不足以消除在中国领导人内部对越共过去“中立”政策的消极看法。当然,他们也还需要确定公开与越共交往是否会引起法国的干预。

在1950年元旦发出的一份电报中,刘少奇告诉林彪等人,越军因作战需要可以经过中国境内或暂时躲避,但应是“非正式地”允许,并告诉越方“不是必要的时候”就不要进入中国境内,如必要过界“亦须在夜间秘密行动”;如越方需要弹药、粮食等,可以在越方保证能够保密时,方可“暂时送给他们不大的一批”。毛泽东很快从莫斯科表示他并不赞成这种谨慎的措施,刘少奇在五天后的一份电报中告诉林彪,毛泽东认为“必须尽可能给越盟人员及越南人民以便利和帮助”,越方所需弹药、粮食等“应尽力帮助”,毛泽东要求应将越方“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样”。<sup>③</sup>

1月2日,刘少奇电告林彪等人,对越代表访问北京一事,“在中央未公布前应暂时保守秘密”。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刘少奇再电林彪,指示后者要给予越共代表团“热情招待并用最迅速的办法送他们来北京”。<sup>④</sup>不过,他这时仍然认为双方联络不畅,在北京的越方代表并不能解释清楚到底需要何种援助,故中国不能盲目地提供援助,更不能有求必应。<sup>⑤</sup>刘少奇这时还不知道,他将在北京接待的越代表是胡志明。

胡志明这时决定亲赴北京求援同越共中央召开的全国代表会有直接关系。这次会议认为越军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包括缺乏武器装备和军事干部等,寻求中国援助是解决困难的唯一办法。就在胡志明启程的时候,1月15日,越南宣布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周恩来于三天后回电,宣布中国与越南建交。<sup>⑥</sup>这是中国迈出援越抗法的重要一步,也是越南得到的第一个实质性的政治支持。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撰文称1月18日是“外交胜利纪念日”,是“举国欢腾的日子”。<sup>⑦</sup>

1月25日,胡志明到达武汉。刘少奇这时才从中南局发来的电报中得知,“负责的”越代表是胡志明本人,建国后到访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他立即指示中南局不

① 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2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1986, p. 10.

②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1—1196页。

③ 刘少奇《关于允许越南军队必要时到我国境内躲避等问题的电报》(1950年1月1日、5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70—71页。

④ 刘少奇《中央为护送越南代表团来北京事给林彪等的电报》(1950年1月2日、6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31页。

⑤ 刘少奇《关于援助越南军火物资问题的电报》(1950年1月11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315页。

⑥ 周恩来《关于中国与越南建交的电报》(1950年1月18日),《人民日报》,1950年1月19日。

⑦ 郭明、罗方明、李白茵编《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上),北京:时事出版社,1986年,第10页。

要公开此事,只在党内表示秘密欢迎,并善加款待后“周密护送来京”。第二天,他电询毛泽东对胡志明来北京是否要公开欢迎?这时中苏谈判正取得转折性的进展,毛泽东复电表达了极大的热情。他要求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等都前往车站迎接,越南要求的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并希望胡志明能等他和周恩来回京见上一面,举行今日所称的“峰会”。他随后又发一电报说,越方在战后搞的“中立”政策不是原则错误,意即中方不必再受过去的看法约束。28日,刘少奇将胡志明的一封电报转给毛泽东,胡向毛泽东、斯大林和周恩来提出打算秘密访问莫斯科,以便一举实现中越“峰会”和苏越“峰会”。

1月30日,胡志明到达北京。刘少奇当时只派杨尚昆到车站迎接而且继续保密。当晚,刘少奇设宴招待胡志明并举行会谈。胡志明对所要求之援助是富有想象力的,他甚至提出要得到飞机等。刘少奇表示可以满足越方的大部分要求,具体办法和内容要等同毛泽东商量之后确定。刘少奇还表明,中国并不急于同法国建交,相信援越可能不会对法国承认新中国有实质性的影响。<sup>①</sup>胡志明在会谈中解释了越共过去一度搞过的“中立”政策。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口径说那不是原则性的错误。

刘少奇对胡志明的气质印象深刻。会谈后,他电告毛泽东说胡志明“年已六十”,看着很瘦“但尚健康”,特别是光脚走了17天才进入中国。他本人因担心离开“战斗岗位”时间过长而打算取消访苏,为见到毛泽东而在北京等一个月亦“认为不可能”。毛泽东立即回电力邀胡志明访苏,他告诉刘少奇,斯大林是在他的劝说下才同意立刻接待胡志明的,斯大林本来希望在苏联承认越南后胡再访问莫斯科。现在胡志明如嫌路远不愿意来,他会再与斯大林电话协商。

刘少奇接到电报后再与胡志明协商,后者遂毅然决定2月3日启程前往莫斯科。他们当即与苏联驻华代办商量是乘火车还是飞机。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从莫斯科发来一封贺电,问候胡志明并告之“苏联已承(认)越南”,中国已代为转达了越南要求各苏联阵营国家承认并建交的文件,估计这些国家“亦可能承认”。<sup>②</sup>就这样,中国顺便把越南也带到苏联阵营,胡志明则必须要到莫斯科共襄盛举了。为了能使胡志明顺利成行,毛泽东还促使苏方派飞机接胡志明,以致后者2月6日便抵达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期间,斯大林会见了胡志明,不过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在胡志明到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告诉毛泽东,援助越共之重任可由中国担任,苏联可提供一些物资

<sup>①</sup> 实际上中国与越南建交是法国当时没有寻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原因。可参阅 Zhai Qiang, “Transplanting the Chinese Model: Chinese Military Advisers and the First Vietnam War, 1950—1954”,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57, No. 4, October 1993, p. 692.

<sup>②</sup> 刘少奇《关于胡志明访问中国和苏联的电报》(1950年1月、2月),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421—426页;《毛泽东、周恩来为问候胡志明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年2月1日),载中共中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54页。

从旁协助。<sup>①</sup> 胡志明当然希望苏越关系能更密切。2月16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胡志明借参加宴会的机会,向斯大林提出越南希望也与苏联签订同盟条约。斯大林除了高度赞扬胡志明很有智慧,其他未置可否。<sup>②</sup> 至此,中苏基本协调了在印支地区的政策,即由中国担负起支援胡志明革命的主要责任,苏联则给予支持。

中国的援越抗法政策最终确定下来是在毛泽东等访苏回国后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不久,即接到罗贵波从越南前线发回的电报,他建议在中越边境的高平、老街等地区发动一场战役,打开中越边界的交通。罗贵波还提出需要向越共提供15000人的武器装备,以及派遣一批从营到军级的干部前往越军担任军事顾问。中国领导人接到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援越问题。<sup>③</sup> 这次会议决定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和派遣军事顾问团的方式,帮助越共打败法国殖民统治。援越抗法政策终于确定下来。

## 二、“积极援助 决不包办”

从4月开始到9月,中国为了实施边界战役,立即向越共提供了各种枪支15700支,各种火炮及火箭筒500余件,以及大量弹药、粮食、药品和通讯器材,并有大批越南军人进入中国边境地区接受军事训练和接收武器装备。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任命韦国清为军事顾问团团长。4月17日,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下达抽调干部组建顾问团的命令。组建工作于5月中旬完成,共调集从兵团级干部到工作人员共281人。<sup>④</sup> 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等在中南海接见了军事顾问团的团以上干部。结合此前的决策过程综合分析他们在此次会见中对援越抗法政策的阐述,可以大致将这项政策概括为“积极援助,决不包办”。

援越抗法政策包含着比较复杂的动力,既有支援东亚革命运动的强大的内在冲动,也有对国家的基本考虑,还有中苏同盟的影响,故有必要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如前所述,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援越抗法的巨大热情,他尤其强调这是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苏结盟无疑强化了这种义务感,使中国领导人愈加认为有必要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3月1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有关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示,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共应给各

① 龚金波《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纪行》载《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当事人的回忆)》(以下简称《实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91页。

② 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1950.1—1958.10)》,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③ 参阅张广华《中国援越抗法重大决策秘录》,载《实录》,第28页。

④ 参阅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以下简称《史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3页。

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等“兄弟般的帮助”，“详细的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不能表现出“冷淡和骄傲”。<sup>①</sup>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援越抗法势在必行，要确定的只是方式和计划而已。

援越抗法是建国后第一次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实践，中国领导人的确表露出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毛泽东在6月27日对顾问团的讲话特别清楚地展示了他所理解的国际义务，即取得国家政权的共产党“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他号召顾问团成员发扬很高尚的精神，因为越南是很艰苦的，“要打摆子，有牺牲的危险”，至于何时能回来则“不要急”。刘少奇、朱德也同样强调了援越“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是“重大的国际任务”。<sup>②</sup>

在中国领导人的认知中，所谓国际主义在理论上是基于阶级认同的一种原则和义务，必须是无私的和不可附加其他政治条件的；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混杂着儒家道德风范和历史经验的理念、道义原则。这种认知导致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特别关注中国国际援助行为在道德层面的完美度，中国对外援助在行为上应该表现得更近似于中国历史传统中行王道的伦理再现。他们十分注意塑造一种他们认为是新型的党际关系，中国应树立高尚的道德形象，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中国顾问们做到高大全，越方自然会心悦诚服。毛泽东在讲话中用了不少篇幅告诉军事顾问们应该如何做人。他尤为强调“搞好团结”，“不要看不起人家”，“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不能表现出我们胜利者的骄傲自满”，顾问团甚至要做到儒家提倡的每日“省吾身”的境界，最长不超过一周便要认真反省一次。他甚至提到汉代那时起“中国曾经欺负过越南”，例如“马援征交趾”什么的，顾问团应该就这类历史问题向越共道歉，等等。刘少奇在会见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谈话。<sup>③</sup>毛泽东后来还亲自在王稼祥起草的军事顾问团《工作守则》中增加了“热爱越南人民的一草一木，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sup>④</sup>在向越军提供武器装备的那些电报上，毛泽东时常会加上“应该是好的和合用的”等批语。<sup>⑤</sup>为了确保上述道义原则被坚决执行，中国领导人同时要求军事顾问团的领导人遇到重要问题必须“请示报告”。<sup>⑥</sup>

中国领导人在提倡国际主义义务的同时，也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中国地缘安全的关切。他们相信帮助越共“也对我们自己的安全有利”，是“一举两得的事”。<sup>⑦</sup>从当时中越边境地区的局势看，中国领导人更有理由对法国在印支的军事存在感到担忧，尽管这种担忧达到何种程度才是合理的这一点是需要认真鉴别的。法国人当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一九四八—一九六九）》（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5页。

② 于化辰《援越抗法斗争中的韦国清同志》，载《实录》，第38页；另参阅《史实》，第6—7页。

③ 于化辰《援越抗法斗争中的韦国清同志》，第38—39页。

④ 罗贵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载《实录》，第14页。

⑤ 毛泽东《关于援助越南武器的批语》（1950年3月、4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北京：军事科学院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5页。

⑥ 罗贵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第12—13页。

⑦ 龚金波《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纪行》，第190页。



在中越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部署和军事侦查,是为了防止国共战争蔓延到越南,所以要求进入越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必须放下武器。不过法国政府内部认为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很可能会支持越共。<sup>①</sup>正是在冷战开始向东亚蔓延的背景下,法国越来越多地向美国寻求援助,而这个蔓延的过程中存在着两大阵营之间明显的互动。

1950年2月1日,就在苏联等国家外交承认越南一天后和毛泽东说服斯大林邀请胡志明访苏的当天,美国国务院一个工作小组提交了一份有关印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中苏正共同努力“颠覆”反共的东南亚国家政府,那里“正处于落到共产党统治的危险之中”,法国军队“正在抵抗红色中国共产主义的向南扩张”,法国需要援助,美国的选择无非是“要么支持印度支那的法国人,要么眼看着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sup>②</sup>2月7日,杜鲁门政府宣布承认法国扶植的保大政府。5月1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向保大政府提供100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在宣布在朝鲜半岛进行全面干涉的同时,批准向印支地区提供军事援助和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sup>③</sup>杜鲁门随后宣布向法国提供1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军用运输机在两天后开始在越南为法军空投物资,美国对法国殖民当局的援助当年即达到1.5亿美元。8月12日,中国军事顾问团到达越南高平的广渊地区。9月间,美国也应法国的请求,向越南派遣了一个军事援助顾问团,帮助法军训练越南军队和从事战略咨询。<sup>④</sup>

中国出兵朝鲜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印支政策。此前美国认为印支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遏制苏联的影响扩大;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美国则断定中国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威胁,美国东南亚战略的重点是致力于遏制中国的扩张。<sup>⑤</sup>这种变化酿成了后来美国长达十年的军事干涉,当下则是决心给予法国越来越多的援助。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全面干涉加剧了中国领导人的担心。6月27日,就在杜鲁门政府宣布加强对法属印支的援助的同一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将越南局势同美国在朝鲜的干涉联系在一起,他们说美国在“朝鲜、越南的行动,是想造成对我们包围的形势,一有机会,就会直接对我们”,“唇亡必齿寒”。<sup>⑥</sup>11月,罗贵波从越南返回北京汇报工作,毛泽东指出中越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即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法国。他说越南驱逐了法军,“中国的南部边疆也就解除了法国殖民者的威胁”。<sup>⑦</sup>这时志愿军已经在朝鲜同美军直接作战,中国领导人对地缘安全的重视程度必然大幅上升。

对地缘安全的关切既是导致中国援越抗法的原因,也是导致中国领导人对越南

① 参阅于格·代尔泰《法国对中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作用的看法》,载杨保筠、于向东主编《变动世界中的莫边府战役与日内瓦会议》,第118页。

② Gareth Porter, *Vietnam: A History in Document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9, pp. 86—87.

③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400页。

④ George C. Herrin,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p. 20.

⑤ Russell D. Buhit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 1945—1954*,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1, pp. 205—206.

⑥ 窦金波《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纪行》,第187、190页。

⑦ 罗贵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第8页。

抗法“不包办”的一个原因。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决定采取有限度援助越南的方针,所谓“不包办”首先就是坚持中国军队不直接在印支参战,他们始终坚持了这个原则。1952年7月11日,罗贵波曾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为了顺利完成西北战役计划,越共希望中国云南部队能参加作战。中央军委10天后复电明确予以拒绝,指出不能出兵深入越境配合作战“是早已确定的一条重要原则”。<sup>①</sup>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坚持不直接参战,首先是为了避免引起美英法等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干涉,这个原则是毛泽东在1949年渡江战役后答复斯大林时确定的。当时斯大林因为担心引起美英法干涉,建议中共军队占领西南中心城市后,不要急于向边境地区进军。毛泽东则坚持要控制全部国土,同时又通过不到境外作战来避免外国军事干涉。<sup>②</sup>同时,中国领导人也不允许越共军队进入中国领土作战。1950年1月23日,越共中央曾提出派部队进入中国领土协助中国军队截击国民党残部。26日,刘少奇复电婉拒越方建议,他说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消灭了,“越南部队不必到中国地界来”。<sup>③</sup>

毛泽东是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提出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的设想的,这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之一。在国共内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援助包括向东北地区派遣技术顾问,从未忽略尽一切努力避免给美国指责苏联介入中国内战之口实。访苏期间,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就提出,解放军攻打台湾时希望苏联秘密出兵参战。斯大林则表示,“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的干预提供借口”,所以他建议派遣苏联的“参谋人员和教官”。<sup>④</sup>这是后来苏联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的由来,很可能也是毛泽东遇到胡志明求援时会想到派遣军事顾问的直接原因。因为同苏联一样,中国在印支也面临着不能给“美国的干预提供借口”的相似情况。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后来派遣军事顾问团也是相当谨慎的,他们坚持并非常注意军事顾问团必须采取秘密的方式。毛泽东告诫即将赴越的干部们,“行动要绝对保密,不要张扬,连亲友也要保密”,顾问团在越南要有代号,要多穿便衣或越军军服。总之就是不要给美英法等国家“找借口的机会”。<sup>⑤</sup>事实表明,中共领导人的谨慎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些措施对防止美国介入和后来的日内瓦谈判成功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战略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在华北地区,他肯定不希望因为过度援助越共而使中国军队被牵制在西南方向。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大军入朝作战,中国领导人当然更不会派兵进入印度支那。

① 参阅《史实》,第58页。

② 《斯大林给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5月26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存, No. 16522 《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6月12日)。

③ 刘少奇《中共中央为告国民党军残部已基本被消灭给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的电报》(1950年1月23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401—402页。

④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存, No. 00255。

⑤ 龚金波《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纪行》,第195页。

不过,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宁可在朝鲜半岛用兵,却不愿直接卷入印支战争,还是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援越抗法决策与中苏结盟几乎同步,斯大林在印支问题上不积极的态度不可能不影响中国的政策。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法国是苏联在欧洲的“统战对象”,斯大林还需要考虑并帮助法共扩大在法国国内的政治影响。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友直接与法国在印支作战,苏联的欧洲政策和对外关系必定受到严重冲击,这是苏联不希望看到的局面。进一步说,在中国领导人的观念中,法国是反动程度大大低于美国从而需要区别对待的资本主义国家,<sup>①</sup>实际上它也没对新政权表现出特别的敌意。所以,中国领导人在避免引起美国介入的同时,也需要与苏联协调行动以及争取在对法关系上留有余地,这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当然,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而中国领导人坚持不在印支用兵,这在越方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尤其是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中国领导人拒绝派兵进入越南实施小规模的支持作战,毛泽东甚至都不同意越军将法军战俘送到广西境内。<sup>②</sup>这样肯定是有潜在的负面影响的。

中国领导人坚持这一原则对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无疑是必要的。美国政府当时无意直接卷入印支战争,不过也是有条件的,一旦中国军队直接在越南作战,美国至少会派遣海空军参战,甚至有可能动用海空军攻击中国本土。<sup>③</sup>越领导人也许会寄望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断然出兵印支。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不仅要向越方解释朝鲜局势,而且还需要首先向派驻越南的中国顾问们解释清楚,中国在朝鲜和越南的援助“意义同样重大”,出兵朝鲜和不出兵越南都是根据“实际情况”。<sup>④</sup>

### 三、推广“中国革命经验”

中国领导人从决定援越抗法开始就很重视在印支推广中国革命经验,他们相信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也必然会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其经验特别是对东亚革命运动具有普遍意义,越方需要认真学习并加以运用。不过如前所述,他们相信模范的行为更有感召力,而且基于中共经受过的惨痛教训,他们有意识地避免苏联式的“强加于人”。据罗贵波回忆,毛泽东曾经“有些激动”地谈到“中央苏区”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毛泽东心目中,李德不仅给中共的事业造成莫大损失,而且“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神奇十足”。这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也是面目可憎的,毛泽东决不允许他麾下的战将

① 《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问题给东北局电》(1948年11月23日)。

② 毛泽东《在争夺战中大量歼敌有生力量是很有利的》(1950年9月2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15页。

③ 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p. 22.

④ 罗贵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第5—6页。

们变成李德再世。他谆谆告诫他们千万小心谨慎,不要有“胜利者的骄傲情绪”,不要“强加于人”,“不能摆大国的架子”,否则将事与愿违。无论哪个中国领导人都在提醒前往越南的干部,一定要谦虚谨慎,要相信越南人自己会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sup>①</sup>中国领导人希望得到的不仅是越方按照中国革命经验走下去,而且要他们心悦诚服,这才是国际主义的最高境界和最佳效果。苏联人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才导致中共领导人对他们很不满意。

罗贵波等到越南后,相当严格地践行了毛泽东强调的道义原则。1951年6月2日,罗贵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他会经常受邀参加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被要求提供意见。他的原则是能不参加的会议就不参加;参会只提自己了解情况的、成熟的和对方可能接受的意见;重要问题先向中共中央报告和请示;凡涉及越共内部的人事、历史等问题均不参与、不发表意见。这些原则得到中国领导人的首肯,不过他们希望他还是可以更积极一点。<sup>②</sup>11月间,胡志明当面向毛泽东提出,邀请罗贵波参加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当即表示接受,但在胡志明走后他告诉罗贵波,参会必须谨言慎行。罗贵波则继续坚守未经中央批准不向越方提出任何建议的原则。

尽管中国顾问团言行谨慎,但越方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态度显然是很受关注的。初到越南的罗贵波很快就报告中共中央,越共对中国革命的经验似乎并不重视。5月8日,刘少奇在复电中提醒罗贵波,“根本不要用过多的心思去注意越南同志这些毛病。更不要去批评他们这些毛病”。他所说的“毛病”包括越南人“害怕说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对中国革命的经验不重视,更多地依赖外援,随便开口要帮助等”。刘少奇要求罗贵波“诚恳老实和热情地”在各个方面提出建议并介绍“中国的经验”,假以时日就会有效果。<sup>③</sup>20来天后,罗贵波就在一个电报中告诉刘少奇,他经过多方了解证明过去是判断“有偏差,应予纠正”,越方“基本上都是欢迎和接受中国革命的经验,他们一致认为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尤其是中共已经总结与纠正的缺点和错误中的经验,基本上适合和适用于越南”。不仅如此,越方还认识到“过去越南得不到解决的问题,现在有了解决的图景,过去找不到的方向,现在有了指针”。<sup>④</sup>还无从知晓越南领导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转变,或者说罗贵波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越共中央与过去看到的竟是如此之不同。刘少奇很快回电表扬罗贵波说:“你对越南同志重视与学习中国革命经验一点,改正以前错误的看法,是很好的”。他鼓励罗贵波和其他人在“介绍中国革命经验方面可以多吃一些工作”,但“绝不可

① 参阅《史实》,第6页。

② 刘少奇《中央关于罗贵波参加越南劳动党会议及提供意见时应采取态度的指示》(1951年6月25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04—505页。

③ 刘少奇《中央对罗贵波在越南工作的有关问题的指示》(1950年5月8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6—147页。

④ 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211页。

性急,不可自以为是”。<sup>①</sup>

战争中打胜仗决定一切。越方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态度是在边界战役后根本改变的,他们因战争胜利而信任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边界战役发起之前,越军原拟先攻占高平。陈赓到达越南后提出先攻占东溪,取得中共中央同意后便开始说服越军指挥员。他的主要论据就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即“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役结束后,胡志明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说,他认为边界战役的胜利“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毛泽东路线的胜利”。<sup>②</sup> 10月下旬,越军召开边界战役总结会议,越主要领导人均出席。陈赓在发言中“深刻阐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和人民军队思想”,还介绍了“中国革命战争经验”。胡志明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中国的援助,他说边界战役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长征的发言肯定是最令人鼓舞的。他说边界战役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同胡主席思想相配合的胜利”,特别是越军指战员从战役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完全适用于越南抗法战争”。<sup>③</sup> 越方此后一直宣传越南革命需要学习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的经验”,因为中国的经验“最适合我国的环境和水平”。<sup>④</sup>

此后不久,罗贵波再次回国述职。毛泽东在认真听取前者的汇报后,对中国以谦虚的姿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效果更好这一观点更加坚信不疑,而且他本人的感觉也随之迅速升华。罗贵波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即提出中国的援助应该是“无私的、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这是后来中国阐述对外援助的道义原则的最初版本。罗贵波当时很感动,认为毛泽东“这种国际主义也是世界上罕见的”。<sup>⑤</sup> 总之就是同苏联很不一样。

越方内部的变化进一步增强了毛泽东的信心。1951年2月,越共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一项议程就是确认中国革命经验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越南劳动党以马、恩、列、斯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与越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和一切行动的指南。”<sup>⑥</sup> 此次大会前后,越共《人民报》不断发表文章,阐述学习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意义。

向越南推广中国革命经验的经典范例,是在越军中展开类似中共军队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1952年冬,胡志明访问莫斯科,向斯大林请教越南革命运动的一些所谓重大问题,其中之一是在越南发动土地改革。1953年1月,越共中央四中全会通过决议,准备实行土地改革。3月初,胡志明告诉与他同车返回

① 刘少奇《中央关于援越工作的有关问题给罗贵波的电报》(1950年6月7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210页。

② 罗贵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第7页。

③ 《史实》,第24—25页。

④ 《外交胜利纪念日》(1953年1月12日),见郭明、罗方明、李白茵编《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上),第11页。

⑤ 罗贵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第7页。

⑥ 黄文欢《沧海一粟:黄文欢革命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277—278页。

越南的韦国清,越方将根据斯大林“他老人家”的建议开始推动土地改革。据描述,韦国清当时立即想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担心土改展开后越军中有可能出现波动。他提出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越军中“也要进行教育和整顿”。<sup>①</sup>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越方模仿解放军在内战时期的“新式整军运动”,在军内展开政治教育,包括动员战士进行“忆苦”来激起能够鼓舞斗志的“阶级仇恨”。有的越军部队还观看了电影《白毛女》,据描述“当场有十余人哭倒”,“有一个战士跑到银幕前枪打‘黄世仁’”。<sup>②</sup>这里描述的越军反应同当年解放军几乎是一样的。

推广中国经验的另一范例是帮助越方建立财政制度。1951年初开始,罗贵波等做出巨大努力帮助越方解决财政问题。中国领导人指示罗贵波转告胡志明,越方“可用自力更生的办法在基本上解决”战时财政问题。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越方要认识到自力更生是“坚持长期斗争,战胜法国殖民者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战略”。“一切问题能在越南用自力更生办法可以解决者,应力求在越南就地解决”。<sup>③</sup>总之,越方有必要像当年中共那样树立自力更生的信念,中国顾问将根据中共在革命时期的经验帮助越方建立合理的财政制度和加强贸易来支持其战时经济。事实上越方后来建立的财政制度基本上是中共根据地财政制度的复制。

罗贵波等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们帮助越共中央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财政制度。4月14日,罗贵波报告中共中央,经过整顿税收、控制货币发行、严格财政管理等等,越南争取当年财政接近平衡“是有客观条件的”。<sup>④</sup>5月31日,胡志明曾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报告越共的财政状况,说他们无法解决“收少支多的困难”。三周后,刘少奇在复电中很清楚地告诉他,“你们预算中的收入是可以超过的,你们的开支也可以节省一些”总之越方的财政困难可以“进一步克服”。<sup>⑤</sup>中国领导人非常希望越共中央能从中国革命经验中学会自力更生,当然他们也不愿继续有求必应。

## 四、分歧的由来

从援越抗法政策形成期的指导思想和实践看,所谓“不包办”也包含了不能漫无节制地满足越方对援助的要求。越方从一开始对援助就有过度索要的倾向。最早到北京的李班等便开出包括1000万美元的巨额援助清单;胡志明第一次到北京也提出过援助飞机的要求;他回国后不久又提出要求中国提供人员、各种物资和装备,以

① 于化辰《援越抗法斗争中的韦国清同志》,第66—67页。

② 《史实》,第84页。

③ 刘少奇《关于越南克服战时财政经济困难的电报》(1951年4月20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275—277页。

④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276—277页。

⑤ 刘少奇《关于越南可以进一步克服财政困难问题给胡志明的电报》(1951年6月25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502—503页。

及3000吨粮食等。<sup>①</sup>毛泽东在莫斯科时固然更为慷慨一些,但回到北京后也有所改变。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在援越抗法期间一直在试图控制住越共索要援助的胃口。

从1950年4月开始向越南运送援助起,在云南地区的部队便报告中共中央,越共“要求数目太大,实无力供给”。他们甚至拒绝向越方提供粮食。刘少奇指示陈赓等应根据越共实际需要和中方有支付的能力两个标准提供援助,并要向越方解释清楚,至于粮食等则不可完全拒绝。<sup>②</sup>中共中央在给罗贵波的电报中也告诫他不必有求必应,“当尽可能满足越方要求,不能办到者则无法供给”;其他物资可暂时作为军事援助,都要记录在册,将来越方有能力时“可要求他们偿付一部分物资”,现在先以帮助越军作战为主。<sup>③</sup>

中国领导人的上述行为同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经历有一部分关系,特别是同他们处理苏联援助的经验有直接关系,在这方面他们感到无愧于心。在6月27日会见顾问团成员时,中国领导人就专门提出越方也必须学会“自力更生”。毛泽东很清楚地说明,“不可能把他们的需要包下来”。朱德说,靠中国的帮助“不是唯一办法”,中共军队是靠夺取敌人的武器和自己生产武器打赢内战的,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帮助越军建立根据地。<sup>④</sup>罗贵波曾经当面向毛泽东直陈越方提出的“援助计划太大,要求过高”。毛泽东则表示要用柔性劝说的方式劝告他们,原则是提供“凡是越南实际需要的,我们又有的”。<sup>⑤</sup>后来发生的问题表明坚持这个原则是很有必要的。

1951年3月18日,胡志明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援助1500吨大米、150辆汽车、夏衣10万套等。中共中央很快就决定先援助大米500吨。<sup>⑥</sup>5月15日,胡志明又一次电告中共中央,越南“正处于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他提出再迅速提供1500吨至2000吨大米。刘少奇第二天即批示“如有办法,给他们运去此批粮食为好”。5月23日,中共中央通知胡志明,同意分两批运给越方1500吨大米。但实际情况是越方没有接运这批粮食的能力,而且管理十分混乱。6月21日,中共中央电告越方,3月间运到邻近越南老街的河口镇的500吨大米“你们迄今仍未运走”。在这种情况下“再送去恐受损失”。<sup>⑦</sup>

在武器装备援助方面也有类似问题。中国领导人在1951年初即感到,越方会“随便开出要求援助的货单,有时数目很大”,有些要求甚至“完全不近情理”。他们要求中国军事顾问团对越共的援助请求“均应做负责的审查”,不合理或不可能予以

①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44页。

② 刘少奇《中央关于帮助越南部队来云南整训和装备的电报》(1950年5月23日);《关于支援越南粮食及解决援越物资运输问题的电报》(1950年6月17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186—18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一九四八—一九六九)》(下卷),第186、249页。

④ 《史实》,第6页。

⑤ 罗贵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第8页。

⑥ 刘少奇《关于援助越南粮食问题的批语和电报》(1951年4月30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157—158页。

⑦ 刘少奇《关于援助越南粮食问题的批语和电报》(1951年5月16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362—363页。

满足的要求“均应删除或减少”而且要向越方说明必须爱护武器弹药。<sup>①</sup>5月2日,刘少奇在给中国军事顾问团的电报中专门谈到援越武器装备的管理问题。他说根据来自南宁的报告,援助越方250辆汽车他们只领走65辆,而且交送越方的物资“保管甚差”,公路两旁“遗置很多弹药”,都已经生锈不能使用,仅运回的报废弹药就有300余吨。他要求将此情况转告胡志明,军事顾问团今后必须审核越方提出的军援项目是否为必要。<sup>②</sup>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状况的变化,中国政府逐步加强对援越物资的管理和控制。1951年4月7日,华南分局电告中共中央,越方派驻海南岛的联络人员向海南区党委大量借款,故希望中央迅速指示中南军政委员会华南分会拨付。刘少奇复电说,以后越方借钱必须事先做出预算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才能拨付,海南区党委“不得任意借给他们”,以前未经批准即借给“也是错误的”。<sup>③</sup>8月10日和13日,罗贵波向中共中央报告,中越之间贸易很不平衡,中方已经向越方提供价值210亿元人民币的物资,越方表示到一年后才能偿付150亿元的物资,同时又要中方再提供价值350亿元的物资,问题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实际需要。罗贵波认为“中越贸易目前不可能成为正常的贸易关系”。中共中央复电不同意他对中越贸易的看法,中越贸易“只能按照一般贸易规则进行等价交换,不能与财政援助混同”,越方要尽可能发展出口物资的生产以偿付中方出口物资,这点必须告诉越方。<sup>④</sup>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中国是向越共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军事援助规模巨大,包括各种枪支15.5万多支、枪弹5785万多发、火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枚、汽车1231辆、军服140万多套、粮食和副食品1.4万多吨、油料2.6万余吨,以及大量其他各类物资。尽管如此,双方的军事合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中国援助的项目和数量不能符合越方的预期、中国军事顾问在日常工作中对越军的态度、越军干部对中国军事顾问的不信任等等。尤其是双方在越军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歧,对双方关系的负面影响比较深。

中国军事顾问团对越军的军事战略一直有比较大的影响,不论是在战略谋划还是在具体战役设计过程中,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意见往往是决定性的,而中国军事顾问团则是接受中共中央的直接指挥,其主要战略设想均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看法。按照毛泽东最初的战略设想,中国军事顾问团应该帮助越军在背靠中国的地区打开局面,建立起稳定的根据地。这一战略规划被逐步贯彻到中国军事顾问团的作战计划

① 刘少奇《关于援助越南武器装备问题的批语和电报》(1951年1月31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64—65页。

② 刘少奇《关于改善援越物资管理等问题的电报》(1951年5月2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290—291页。

③ 刘少奇《关于越南劳动党驻海南岛办事处经费问题的报告》(1951年4月10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271页。

④ 刘少奇《中央关于中越贸易等问题给罗贵波的指示》(1951年8月16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674—675页。



中。1950年12月上旬,中国领导人已经形成了先完全控制北部地区然后再进攻中部和南部的战略思路。<sup>①</sup>做这种战略选择首先是中国革命的经验使然。中共在抗战后因控制东北而获得了背靠苏联的战略基地,可以方便地从苏联得到大量的援助。另一方面也同中国军事顾问团对越南战略形势的分析有关。他们认为,越南南部地区远离指挥中心而且被法军封锁,交通联络很困难,“军事工作的办法很少”,所以南方应发展游击战“配合北部战场”战略重点则应放在北部地区。<sup>②</sup>

中国领导人选择这种战略的确对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也是有利的。正如王砚全后来总结边界战役的意义时所指出的“边界战役的胜利迫使法国侵略军设在中越边界的大小据点绝大部分撤退了,使得逃亡越南的国民党残余匪特失去了支持,有利于中国广西、云南当时正在进行的肃清匪特的斗争,有利于中国巩固南部边疆的国防。”<sup>③</sup>边界战役的结果是越军攻占了五个重要的城镇,控制了长达750公里的毗邻中国的边境地区,越北根据地同中国连成了一片。后来相继实施的西北战役、老挝上寮战役、奠边府战役等,差不多都同完全控制越北同中国接壤的地区有关,其结果当然包括“有利于中国巩固南部边疆的国防”。中国领导人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认为中越是相互支持的。

中国当时的战略环境的确正处于持续恶化阶段,主要是美国开始在东南亚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1950年10月,美国首先同泰国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12月23日,美国同法国和保大政府签订了正式的军事援助协议。1951年夏季,美国加快了行动步伐。8月,美国同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美澳新安全条约》。美国加强军事遏制不可能不影响中国领导人对印支战争的战略思考。1951年夏季,朝鲜战场上中美军队沿三八线对峙的战线基本稳定后,中国领导人在印支的战略也越来越明确,就是集中力量夺取越南北部和老挝上寮的战略要点,建立大片背靠中国的战略根据地。

1952年2月16日,从北京返回不久的罗贵波即提出,当年下半年发起西北战役,然后再挥师进入老挝作战。这个作战计划获中共中央同意,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帮助老挝解放,甚为重要”。<sup>④</sup>3月18日,越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西北作战计划。会上多数越军干部不赞成中方关于9月组织西北战役的计划。他们的理由多种多样,其中有一些反映了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深刻猜疑,而且后来被证明是很难改变的。根据韦国清向毛泽东的汇报,当时越军的高级干部中有人认为,中方建议发动西北战役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国的边境地区,“是因为对中国有利”。<sup>⑤</sup>

① 毛泽东《请求苏联帮助解决汽车和汽油问题》(1950年12月8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03页。

② 刘少奇《中央关于暂时不派中国顾问到越南南部游击区的电报》(1951年3月12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155—156页。

③ 王砚泉《越南边界战役前后的陈赓同志》,载《实录》,第129页。

④ 参见《史实》,第56页。

⑤ 于化辰《援越抗法斗争中的韦国清同志》,第75页。

1952年9月下旬,胡志明秘密访问北京,通过同中国领导人的直接沟通和协调,西北战役计划才最终确定下来。10月18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韦国清、罗贵波等参加。会议决定执行胡志明与中共中央商定的原则,按计划发动西北战役。西北战役胜利后,中国军事顾问团参与到随后展开的老挝作战之中。中共中央提出发动上寮战役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北战役的成果,将越共的西北根据地与老挝北部连成一片。对中国来说,同时也就是在中越、中老边境形成了一道屏障。

越方的猜疑并没有因为西北战役和上寮战役的胜利而消除,尽管那里形成的局面对他们也是非常有利的,没有这些战役打下的牢固基础,就没有后来奠边府战役的胜利。1953年夏季,中国军事顾问团开始策划冬季作战。这时越军干部中再次出现波动,用韦国清的话说就是“旧病复发”,他们再次猜疑中方作战计划的动机。

中国领导人这时已经掌握了法军的纳瓦尔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经过持续作战最终在越北地区消灭越军主力。法军7月开始从北部到中部、南部展开扫荡作战。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纳瓦尔计划如果成功不仅对越共不利,而且很不利于改善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环境,故必须反击,绝不允许法军在越西北地区获得立足之地。1953年11月20日,法军空降部队攻占西北重镇奠边府。24日,韦国清在越军委高级干部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发动冬季攻势的意义,他说继续将越北作为战略方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做这样的战略选择也是同中国革命的道路一样的。<sup>①</sup>越军再次接受了中方的作战计划。由于法军调整军事部署,越军的冬季攻势后来很快发展成奠边府战役。该战役的发生主要是基于军事形势的变化,但它很快成为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的外交筹码,并成为印支停战前的最后一战。当周恩来领导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坚决贯彻在越南以南北分界停战的方案时,中国军事顾问团相继提出并贯彻的一系列军事计划造成的战略格局变得十分清晰,它成为越南南北分治的基础。

随着1954年7月各方在日内瓦达成停战协议,援越抗法即告结束。作为建国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援外行动,援越抗法中形成的主要原则和获得的主要经验,包括推广中国革命经验的冲动和尝试等等,均对中国援外政策造成深远影响。当然,它遗留的一些矛盾也在后来出现的特殊条件下发酵并造成重大的后果。

(责任编辑:陈志瑞)

<sup>①</sup> 王砚泉《越南边界战役前后的陈赓同志》,第81—83页。